

三类地区金融风险暴露概率较大

贺军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多个表现中,金融风险增高无疑是其中的一种。银行坏账是观察金融风险的窗口之一。根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29%,第三季度数据为1.16%。单季度坏账增加0.13个百分点,为2004年以来最快。包括政策性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业金融系统坏账率为1.64%。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由第三季度的247%下降至230.5%。以银行贷款余额86.8万亿元计,2014年银行系统的坏账规模大约为1.42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地方经济有很强的关联。国内地方经济困境加剧又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

大,地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下行;二是房地产业开始停滞或负增长,地方财政受到很大冲击,地方债务问题的压力明显加大;三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日益困难,支撑过去铺开的摊子难度加大;四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不少基础资源行业遭遇困境,拖累地方经济下滑。

地方经济遭遇的困境,使得各个地方的金融风险普遍加大。由于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金融环境、企业发展等因素不同,金融风险的暴露程度也不相同。由于地方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往往表现为复杂的系统问题,它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能够解决的,因此,从区域角度观察地方经济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极为重要。

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金融风险呢?粗略归纳,有如下一些类型的地方经济属于金融风险的高发区。

一是经济高度依赖少数资源产业的地区,如能源城市、矿业城市等。日前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吕梁市的经济在一年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反转”:在2013年,吕梁还是山西的增速冠军,但2014年GDP增速预计为-2%,在山西省内倒数第一。吕梁因煤闻名,其2.1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含煤面积1.1万平方公里。在过去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吕梁依靠优质煤炭出现井喷式发展,GDP维持着两位数增速,多年保持省内第一,创造了“吕梁速度”。如今吕梁随着煤炭行业的低迷陷入困境,吕梁市下属某县的工业占比达95%以上,几乎没有服务业,而工业中有85%与煤炭相关,该县在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左右。工业比重近70%的吕梁市,其工业增加值增速预计为-5.6%,GDP增速预计为-2%,财政收入减少20.3亿元。这类衰落之下的资源型城市,往往成为金融风险高发区。

二是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地区。据有关研究机构的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超过3.1万亿元,而201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为6.89万亿元,土地出让金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45.4%。2014年房地产市场下滑,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28%至2.3万亿元。尽管如此,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仍相当于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75860亿的30%以上。要指出的是,土地出让金只是地方计划外收入的一种,如果以口径来计算地方财政与房地产的关系,房地产业的占比会更高。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二、三、四线城市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一般在40%以上,甚至

有的地方达到60%-70%。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地方经济,目前往往都是高风险地区。

三是地方债务高企的地区。自2008年以后,中国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府债务的扩张有很大关系。2013年底中国官方公布的截止2013年上半年的地方债务为17.9万亿,此后的债务清理与偿还对地方政府是个巨大的压力。初步预计,2015年中国将有约2.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到期。为化解巨额存量债务,2014年债务利息支出就占新增社会融资的逾50%,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质量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地方债务对地方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打击,远不是几个数字所能反映,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的本地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企业债务都十分惊人,不少地方受到减收(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增支(财政支出刚性增加)、偿债(债务偿还高峰期)这“三座大山”的重压,对地方金融环境有重大破坏。

更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地方经济、产业与债务问题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复杂的地方经济金融环境的整体“塌方区”。一旦这种风险形象形成,将会引发市场对地方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度警惕,从而显著抬高当地融资的成本,加大当地的融资难度。这些地方出现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自然也会较大。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赴日抢购马桶盖的多重启示

王石川

最近一篇名为《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帖子在网络上热转,文章引发了对中国制造和日本产品的思考。最近日本的温水洗净马桶盖又突然人气大增,成为不少人赴日购物清单上的首选。媒体报道说,日本有一条街已经没有货了,中国客人现在根本不问牌子,哪家有货就赶紧买,往往上午来货下午就没了,有些货厂家根本来不及做。

赴日购物将马桶盖当作首选,恐怕多数人没有想到。日本的马桶盖有什么神奇?尽管售价不菲,即使享受8%的消费税减免,售价也在2000元左右,但其功能全面,带杀菌除臭、加热、冲洗等功能,“让屁股洁净似玉,如沐春风”。赴日抢购马桶盖,说明日本马桶盖质量好。古语说得好: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还说明什么?还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了。

除此之外,还说明什么?起码还说明两点。其一,在全球化时代抵制外国产品行不通。日货已经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全部抵制日货,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极不便利。就算不是日本货而是美国货,如iPhone5,它的屏幕主要供应商是夏普,内存主要提供商是东芝,尔必达,内置主板、电容器主要是村田制作所和日东电工。

多年前就有数据称,美国波音公司的波音飞机有一万多个零件,由70多个国家生产,最后在西雅图组装完成。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早已形成,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相互依赖。比如苹果手机,技术虽不是中国的,但在中国生产。同样的逻辑是,如果某国民众抵制中国货也很难,除非他不使用苹果手机。对于消费者来说,只

要经济条件允许,哪国的商品优秀就购买哪国的产品,再正常不过,比如日本的马桶盖。因此,莫轻言抵制XX货。

其二,国货当自强。中国人连一个高品质的马桶盖都制造不了吗?举世闻名的制造大国为什么不能生产比日本马桶盖更好的马桶盖呢?这是不少网友的悲叹。专家分析的原因可归为几点:一是我们曾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技术创新因此被弱化;二是传统制造业害怕转型,自主创新能力强,抄袭、山寨产品多,挤压高质量企业生产空间等等。空调行业领军人物董明珠就多次提到,一些企业长期存在投机心理,总想多赚点钱,结果是疏于研发,偷工减料,破坏了整个行业。在日前的某高峰论坛上,董明珠举例,在中东卖空调坚持自主品牌,经销商却建议到泰国生产,因为中国制造是“低质低价”的代名词。

无论什么原因,都说明我们确有不足之处,有制造,缺乏创造;制造行,智造弱。消费者是最务实的,如果国货足够好,谁还购买价格高的洋货?如果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又怎么会沦为为别人加工产品的地步?拿出了足够过硬的产品,也许就该有洋人到中国抢购中国货了。

“陶瓷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说英国的陶瓷或者日本的陶瓷做得比我们好?”这是一名中国企业家的困惑。这是自问,也是追问,需要回答的不只是该企业家。中国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技术在世界领先,难道还造不出倍受欢迎的马桶盖?技术落后恐怕不是唯一因素,毕竟中国人智商不逊于外国人。我们的体制如何更能激活国人的创造欲,我们的产品如何最大程度满足以人为本,在智能化、精细化上下功夫,同样需要思考。

“降准”非刺激楼市 市场勿自作多情

项峥

上周,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但这一利好措施并未给股市带来刺激,随着“降准”政策继续发酵,反而有关楼市的舆论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对降准刺激楼市活跃抱了不小的期望。但笔者以为,“降准”源于我国货币供应机制转变,主要应对结构性通货紧缩,本次“降准”无关楼市兴衰,加快去库存仍是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挑战。

央行重启“降准”并非偶然,主要因为当前我国货币供应机制已发生重大变化。去年第四季度,国际收支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急剧增加,国际储备资产减少1844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美元指数将有两位数涨幅空间,我国资本外流压力明显增加。这种变化,使我国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供应中的作用下降,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提供了空间。

可见,本次“降准”更多的是对货币供应机制结构性变化的修复,并不

意味着稳健货币政策方向出现重大调整。针对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松紧适度”货币政策的最好诠释。货币政策无论是使用总量工具,还是使用价格工具,既可能是宏观经济金融条件变化所触发,也可能是主动调控、积极作为。但归根结底,稳健货币政策就是要为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积聚创造一个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降准”将利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弱平衡中艰难复苏,一些经济疲弱的国家相继调整货币政策,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也明显增大,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通货紧缩的迹象,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稳定增长。据测算,本次“降准”将释放6000亿元以上的流动性,显著改善金融机构贷款能力,而去年末非对称降息导致存贷利差收窄,也将刺激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有助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回落。同时,此次“降准”还强调定向降准,推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本次“降准”操作无关楼市运行。虽然货币环境变化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

但本次“降准”很难称得上是楼市利好。对货币供应机制结构性变化的修复,表明了不太可能会向整个经济大幅“注水”,政策目标也显然不是刺激已显疲软的楼市。而“降准”对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的变化,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最终能够多少利好楼市不得而知。从根本上讲,决定楼市兴衰主要还是市场有效需求。由于过去十多年,我国居民购买能力已经过度透支,房价已经明显偏离居民收入和房租租金,导致未来住宅需求增长动力不足。我国已经彻底离开住宅短缺时代,巨大住宅库存已经横亘面前,房地产市场需要从增量住宅需求向存量住宅优化转移,住宅品质建设将会得到市场更多认可。随着不动产全国统一登记制度实施,朦胧中的房产税越行越近,对投资性置业已产生重大影响。

综合来看,制约我国房价上涨的因素不会因为“降准”而消失,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房地产投资价值回落、居民购买力过度透支、住宅库存规模巨大等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综合影响,决定了今年我国房地产业仍将面临调整压力。如何

影视剧掀起反腐风暴



反腐剑指影视圈,紧盯小星与大腕。只因充斥名与利,难免招引钱与权。制作热衷请领导,演出大肆花公款。镁光灯下潜规则,需要法治来清算。

赵乃育/图
孙勇/诗

政府与银行关系好 为何反不利于小微融资

许权胜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人们一直觉得责任在银行,认为银行在信贷资金投放上没有顾及到弱势的小微企业,这才使得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小微企业生存艰难,经营也急转直下。而小微企业出现困难时,银行又常常有抽贷行为,致其资金链断裂,这更加深了人们对银行的不满,批评银行“晴天送伞下雨收伞”。人们之所以对银行口诛笔伐,是因为人们觉得银行没有听从政府的口令,政府定向调控、增加再贷款等一系列举措表明政府在努力帮助小微企业,但银行却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其实,政府与银行的关系直至今日与行政上下级关系还是差不多。由于国家承担着银行的隐性担保,银行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很大,加之银行的高管多是政府空降或任命,金融资源的分配权也就会受到政府的重大影响。既然存在这样紧密的关系,为什么银行还不能好好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呢?这一悖论,要从经济利益结构、利益分配和融资环境三个方面才能得到解答。

首先看经济利益结构。政府一直采用高投资的政策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的高储蓄率刚好为这种模式提供了支撑。高投资带来的好处是政府能创造需求、经济指标能快速提升、效果立竿见影,坏处就是政府没有办法创造老百姓的购买力,容易产能过剩,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产能过剩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极力保护的企业,所以难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自然淘汰,实现市场出清,结果这些企业严重挤占了有限的金融资源,还严重拖累市场的复苏,而且由于政府的保护还要不断投入银行资金,以维持其死而不僵的局面。银行很大一部分资金被这种低效益的企业占有,发挥不出经济效益。所以当前尽管我国的货币总量很大,但银行的流动性还是紧缺,处在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缺钱当然脱不

掉的宿命。

其次从利益分配角度看,政府制定了很有厚度的利差保护银行的利润,而且由于政府与银行之间纠缠不清的产权关系,银行背负着各种经营风险其实未来很有可能转嫁到政府身上,这种未来坏账由国家承担、收益为自己所得的怪现状体现了银行与政府微妙关系的一方面,也是银行大肆扩张而顾虑较小的原因之一,这种扩张也加速了政府投资效应扩大化。

严格来说,我国银行只是政府权力的延伸,银行的人事安排及公司运作存在着极大的政府行为,即使民营银行也逃不脱了这种窠臼,难怪民生银行股东史玉柱近日曾表示:如果这次领导再委派一个陌生空降人到民生银行当行长,将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在这种金融资源分配格局中,其实是政府借助银行管理者实行金融资源的再分配,这种政府权力控制的资本当然会流向权力需要的地方,弱势的小微企业不可能得到权力的垂青。

最后看银行自身的环境。2014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去产能、去泡沫、去杠杆仍然会在2015年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银行不良贷款攀升。加之存款保险制度的即将出台、利率市场化打通最后一公里、金融脱媒和互联网的吸金作用,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提高,资金成本高了,银行贷款利率肯定还会居高不下,经济结构矛盾会随之进一步激化,政府债务也会因为银行利率的提高而更重压力,银行自身经营环境变坏,小微企业想要不受波及是不太可能的。

以上三大不利因素已成为束缚我国小微融资市场的镣铐,那么怎样才能使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难点冰消雪融呢?在于政府放松市场管制,也在于政府划清与银行的界限,取消对银行的兜底,在于拓宽融资渠道,给金融市场充分竞争。其政府的治理思路应该放在铺设适合经济运作的公平竞争平台,让资金伴随着价格信号流动,使真正有效率的企业胜出,那样的话,融资难问题一定会随之消除。

(作者单位:安徽舒城农村商业银行)

刹住数字城镇化的歪风

叶祝颐

“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这是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会议上一些委员们对城镇化不良现象提出的批评。

一些地方将发展片面理解为转户口,卖土地。为了达到城镇化目标,有人强征良田,盲目赶农民上楼,不仅破坏了农村风光,还导致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网。农民在城镇缺乏谋生的技能与精神归属感,回农村又没有土地。他们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显然不符合城镇化的本意。

曾有报道说,一场被戏称为农民“被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这些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这场运动的动力来自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比如,在农民“上楼运动”中,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廊坊市董家湾村,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就连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面也被毁掉。

对此,不仅政协委员要发声,更要创新政绩评价体系,给新农村建设树立界桩,给好大喜功者戴上法律紧箍咒,刹住单纯追求“数字城镇化”,不顾进城农民福祉的歪风。

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客观实际,大规模撤销自然村,生拉硬拽农民上楼。

虽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农民阳台养鸡、客厅喂牛,已经对“被城镇化”投了反对票。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躺在牺牲农民利益的“数字城镇化”政绩沙发上沾沾自喜。

农民“被城镇化”这样一个劳民伤财的运动能在一些地区顺利实施,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在面子工程大链条中,村干部干部的,村干部听乡干部的,乡干部听县领导的,县领导听市领导的……而处在面子工程链条最末端,受害最深的村民心声根本没有人听。